

萧友梅是近代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音乐专业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萧友梅早年留学日本,后又留学德国,并且取得了音乐博士学位。回国之后,萧友梅积极从事音乐教育,尽管这个过程极为艰辛,但是他始终抱着坚定的信仰,在他的努力下,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上海国立音乐院,这所学校的成立为中国近现代音乐专业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留学与办学

萧友梅,字思鹤,广东象山人,出生于书香世家,其父是私塾的教师。萧友梅5岁时,随父定居澳门,在当地一所新式学堂接受教育,此后又转入广州著名的时敏学堂学习。时敏学堂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影响下所创办的,1901年萧友梅随时敏学堂的校长邓家仁一同前往日本留学,萧友梅先后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以及东京音乐学校学习音乐。1906年,孙中山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同盟会,由于孙、萧两家是世交,在孙中山的介绍下,萧友梅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萧友梅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参加了清政府所主持的留学生考试,并且获得了“文科”举人的头衔,第二年被任命为清政府教育部的“视事”。

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推翻满清政府,成立中华民国。由于和孙中山的特殊关系,萧友梅被任命为孙中山的秘书。同年,孙中山在袁世凯的诱逼下,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萧友梅旋即南下广州,在胡汉民所主持的广东省都督府教育司中担任学校科科长一职。胡汉民是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此后一直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负责官员之一,胡汉民与萧友梅有着较为深厚的友谊,一直支持萧友梅的教育工作。随着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萧友梅审时度势之后,选择继续出国留学深造。当时的德国是世界音乐中心之一,莱比锡更是音乐圣地中的圣地,萧友梅选择了当时著名的莱比锡音乐学院,开始攻读博士学位。萧友梅在留学期间,不仅完成了所有的音乐课程,并且掌握了高超的作曲技巧,1916年萧友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其所撰写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更是引起了德国学术界的广泛兴趣。

毕业之后,萧友梅始终关注国内形势,1920年他选

择回国,很快便开始着手音乐教育工作。凭着过人的资历,萧友梅被任命为民国教育局的编审员,此外还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实验小学的主任。在此期间,萧友梅着手编写了一批适合中小学使用的音乐教材,其中较为著名的作品有《乐学研究法》(1920)、《和声学纲要》(1921—1922)、《今乐初集》(1922)以及《新歌初集》等,这些作品中不仅有音乐理论方面的,也有歌曲方面的,填补了当时音乐教育中的多个空白。



萧友梅创办的北京大学管弦乐队

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与近代音乐教育

雷济菁

中国拳法没有被时代而遗忘,是他使得近代武术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永恒的光芒。

三、“国术强国”的理念

我们前面介绍到了高凤岭出生在风雨漂泊的晚清时期,当时的社会内忧外患,外国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在高凤岭学术达到一定的水平时,正值青壮年,对于一个有着民族气节的人来说,高凤岭是断不可能对国家社会的时事置若罔闻的,也是在那样的环境下,使他更加意识到武术强国的理念^[4]。

在自己已经有了能力的时候,高凤岭没有自私地要把自己所拥有的独占,而是发扬祖国千百年来的武术精华,广收弟子,用自己的武功和自己的人格教育学生。1917年,他接受了马良的邀请,和王子平一起担任武术传习所的教员,他在执教的过程中,培养了大批的武术英才。1928年以后,他先后到各个国术馆任教,也发表了一些武术著作。

“‘国术强国’是咱太乙门秉持的信念。”高凤玲的徒孙,现在的武当太乙门的掌门林树基说道。据他回忆,民国时期,当时自己的师伯裘来庚曾率领山东国术馆师生奔赴沂蒙山区,与官兵习练武术,在前线奋勇杀敌,最

后牺牲,而他的父亲林信斋,在抗日战争时期多次冒险绕过封锁线,秘密为抗日武装运送粮食,他的叔叔林经三也参加战斗无数,曾经扮马夫潜入日军驻地探敌情……他们的爱国之心也是在当时受到了高凤岭的影响,因为高凤岭对他们一直以来的教育理念就是,要用自己的能力保卫自己的祖国,把外国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家。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说一下高凤岭自己的态度,他是爱国的,而且他的爱国精神坚定,他是一个习武之人,没有参与到政治当中去,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为国效力,相反的,他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他对祖国的炽热之心。既然文不行,那他就走武道,他把自己一身的武术本领传授给当时的国人,让他们在强身之外还能防敌,这就大大提升了国人的综合素质。他不仅用武术精神来教育人们,还把武术精神永远的传承下去,使得他身上的武术绝学发扬光大,使得中国近代武术能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绽放出属于它的光芒。

在近代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还依然能把武术的精华和武术的精神传承下来,在当时能做到的并没有几个,除了我们熟知的

霍元甲、王子平、孙禄堂之外,高凤岭等一大批的老先辈也是为国家贡献了大半辈子的心血的。他们对武术的执著和热爱,是现在社会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的,在弘扬武术精神的过程中,他们的辛酸与努力,是他们对武术的敬重。中国武术之所以能历经历史长河千年而不衰,与他们奔走忙碌的付出是离不开的。

高凤岭,这一个活跃在近代武术舞台上的大师,随着历史的远去而远去,人不在,名也并不广为人所知,正如当年他默默传承武术精神一样。而今留给人们的,是他用一生心血凝聚而成的武功精粹,虽然他已离我们远去,但他对近代武术的贡献仍值得我们敬仰。可是,时至今日,或许很多的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高凤岭是谁,他们甚至已经忘了精武精神,而今,我们习武更注重比赛得胜的技巧,习武的初衷和精神早已经变味,不知道这是习武之人的悲哀还是我们整个国人的悲哀。

参考文献

- [1]林小美.清末民初中国武术文化发展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 [2]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
 - [3]康戈武.中国武术大词典[M].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
 - [4]刘海钦.中华武术素养读本[M].科学出版社,2011.
- ★作者王军为青岛理工大学讲师。

1922年,在萧友梅的建议下,蔡元培将北大音乐研究会改组为北大音乐传习所,这种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大学音乐专业教学机构,萧友梅被任命为传习所教务主任,负责教学质量监督工作。在任教期间,萧友梅组织成立了一支管弦乐队,由于人才紧缺,乐队连同指挥萧友梅一共才只有17人,麻雀虽小,但这支乐队在五年时间内,共演出四十余场音乐会,演奏了包括海顿、莫扎特、舒伯特等世界级音乐大师的作品。在萧友梅的奔走下,北京当时的高等学府,基本上都成立了音乐系。萧友梅多年苦心经营,随着奉系军阀张作霖入侵北京,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了泡影,无奈的萧友梅只能南下寻求新的发展。

1927年在时任民国教育局局长蔡元培的支持下,民国政府终于同意了萧友梅创办国立音乐院的计划,但是创办的过程也极为艰辛。首先是经费问题,根据萧友梅的预算,以每年招生五十名学生,学制五年,每年的教学经费约在3000元左右,此外学校的建设费用约在6万元,尽管教育部是满口答应,而财政部则以各种理由推诿。萧友梅对此深感无奈,在时任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杨杏佛的帮助下,获得了第一笔资金,总计3000元,凭着这笔微薄的经费,萧友梅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国立音乐院起初租用了陶尔斐斯路56号作为校舍,此后由于经费问题,数次搬迁,一方面由于音乐长期以来不受社会重视,另一方面由于错过了开学期间,公告发出之后,少有人问津,最后在蔡元培担任校长的噱头下,吸引到二十多人,实际上学校一直是由萧友梅全权负责。

经费问题始终困扰着学校的发展,甚至严重影响到学生与学校的关系。1926年6月学校发生了学生罢课事件,萧友梅为此被迫辞职,但是仍旧多次要求教育部免去罢课学生的责任,保留他们的学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萧友梅的请求并没有得到重视,冼星海、蒋风之、陈振铎等人最终还是因为学潮问题受到牵连,被取消了学籍。1929年蒋梦麟再次聘请萧友梅担任音乐学院院长。此时,由于国民政府修改了《大学组织法》,音乐院在该体制中有了合法性,因此在经费问题上有了一定的保障。萧友梅在担任校长期间,尽可能地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发展学校的教育,最终使其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音乐专科学校。

二、音乐救国

1940年12月31日,年仅56岁的萧友梅先生因肾脏细菌感染去世。纵观萧友梅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他将自己满腔的热血和

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音乐。总结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可以归结为四个字,那就是“音乐救国”。萧友梅自幼受维新思想的影响,有着强烈的兴亡意识,此后又加入了同盟会,从事资产阶级革命工作。因此,萧友梅是具有革命思想的。不过,他的革命具体表现在音乐领域方面,而不是政治领域。在音乐和政治两者之间的关系,萧友梅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萧友梅认为自古以来,音乐就是为政治服务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这都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在《歌社成立宣言》一文中他说道:“吾辈为适应时代需要而创作新歌,为适应社会民众需要而创作新歌,将一洗以前奄奄不振之气,融合古今中外之特长,借收声词合一之效,以表泱泱大国之风。”由此可见,在萧友梅的心中,音乐不是一种娱乐工具,而是一种政治工具,是树立民族和国家形象的最佳工具。因此,音乐教育是一种政治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中所不可或缺的。的确,西方音乐享誉世界,对于树立和传播西方国家形象产生了极为深远的作用。贝多芬、肖邦、海顿等等西方音乐大师,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出一种民族精神。民族精神通过音乐这种形式不断地被传递下去,被放大,从而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爱国意识,这是西方强大的根源所在,也正是这种理念推动着萧友梅不断前进。

萧友梅的教育工作与音乐创作与当时的政治事件始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萧友梅一直关注着国家局势。五卅惨案发生后,萧友梅创作了《国难歌》、《国耻歌》,音乐不仅是作者表达愤慨的工具,同时也是攻击的武器,通过音乐的形式,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民族的危亡。九一八事变,萧友梅立即组织学生为抗日军募捐,在当时学校经费困难的情况下,萧友梅师生共筹集了一千多元支援前线抗战。此外,萧友梅连夜谱曲撰写了著名的《从军歌》,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萧友梅并没有离开上海,也没有离开学生,仍旧坚持在教育的第一线,在萧友梅看来,坚持从事教育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抗日行动。1937年,刚刚新建成的音乐院遭到了日军的空袭,学校毁于一旦,萧友梅为此痛心不已,但是并没有就此意志消沉,而是积极组织,恢复教学工作。南京沦陷后,汪精卫政府曾试图拉拢萧友梅,对其威逼利诱,此时的萧友梅尽管贫病交加,且环境险恶,仍旧坚守住了民族气节,矢志不渝。由此可见,萧友梅的坚定信仰与爱国情怀。

三、历史贡献

萧友梅对中国近代音乐专业教育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萧友梅作为一位音乐理论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可以说将自己全部的才华都用以塑造近代音乐专业教育。从北大传习所开始,萧友梅就开始了音乐教育专业化的宏伟事业,可以说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内,这一直是他一个人的事业。从当时社会、政府对音乐教育的态度来看,蔡元培之所以会愿意在北大搞音乐传习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萧友梅。和蔡元培一样,萧友梅也是一个具有纯粹教育理想的人,两者都是淡泊名利的知识分子,因而惺惺相惜。北大传习所的成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音乐专业教育时代。在此期间,萧友梅成立的管弦乐队免费为师生、市民演奏西方音乐大师的著名作品,对于普及音乐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提升了当时作为政治中心北京的文化品位。

从音乐理论方面来看,萧友梅的贡献也是颇为巨大的。萧友梅所著的《和声学》、《普通乐学》填补了国内音乐理论界的空白,这些作品直到今天都是中国现代音乐理论的奠基之作。《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古今中西音阶概说》等著作开创了中国音乐比较学的先河。《中国历代音乐沿革略考》则是系统性地介绍中国历代的音乐及音乐教育,开创了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先河。

萧友梅在上海创办的国立音乐院,尽管一直存在着经费紧缺的问题,但是萧友梅始终凭着一己之力,勉强支撑。萧友梅并没有因为经费问题,而降低教学质量,反而花费重金聘请当时世界级著名钢琴家查哈罗夫担任音乐院的钢琴教师。起初,查哈罗夫并不愿意来音乐院执教,因为这所学校并没有什么名气,但是他被萧友梅的执著精神所打动。1929年至1942年期间,查哈罗夫将自己的艺术与生命都奉献给了这所学校。1930年,萧友梅又力邀留美音乐家黄自担任音乐院教务主任一职。正是在萧友梅的不懈努力下,国立音乐院成为了中国近代音乐的发源地,学校培养了一批在近现代史上享有盛誉的音乐家,例如冼星海、贺绿汀、丁善德、喻宜萱等。此外,国立音乐院是按照西方音乐学校体制所建立起来的,是第一个具有完整体制的音乐学校,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音乐专业教育。

参考文献

- [1]曹理.音乐学科教育学[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2]何晓夏.简明中国学前教育史[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 [3]曹理.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 [4]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 [5]伍雅谊.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广东金融学院公共课教学部。